

❁ 背影丛书



一代报人王芸生

王芝琛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报人王芸生/王芝琛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9

ISBN 7-5354-2874-6

I. 一…

II. 王…

III. 王芸生-传记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9433 号

策划编辑:刘硕良

责任编辑:吴裕康

袁鸿慧

霍晶

美术编辑:王东方

王玲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7.25 插页:2

版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0 千字,图片 162 幅 印数:1-5000 册

定价: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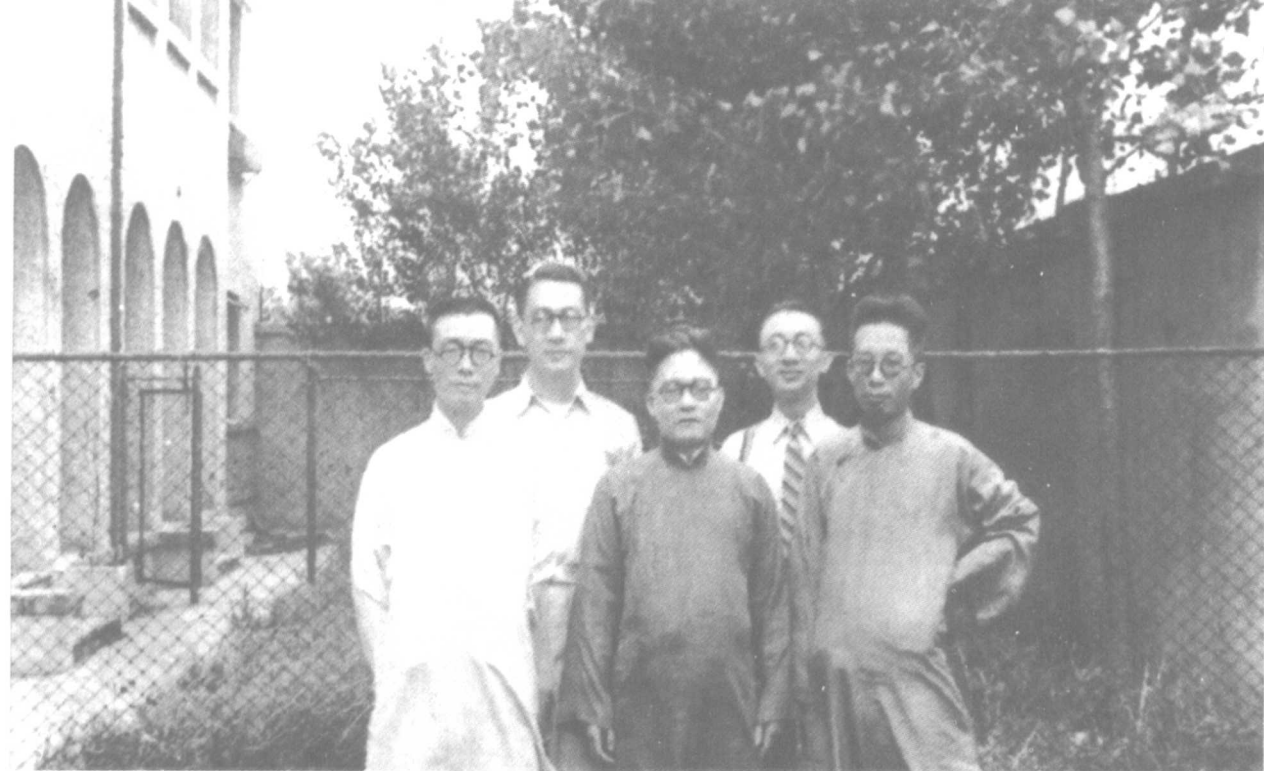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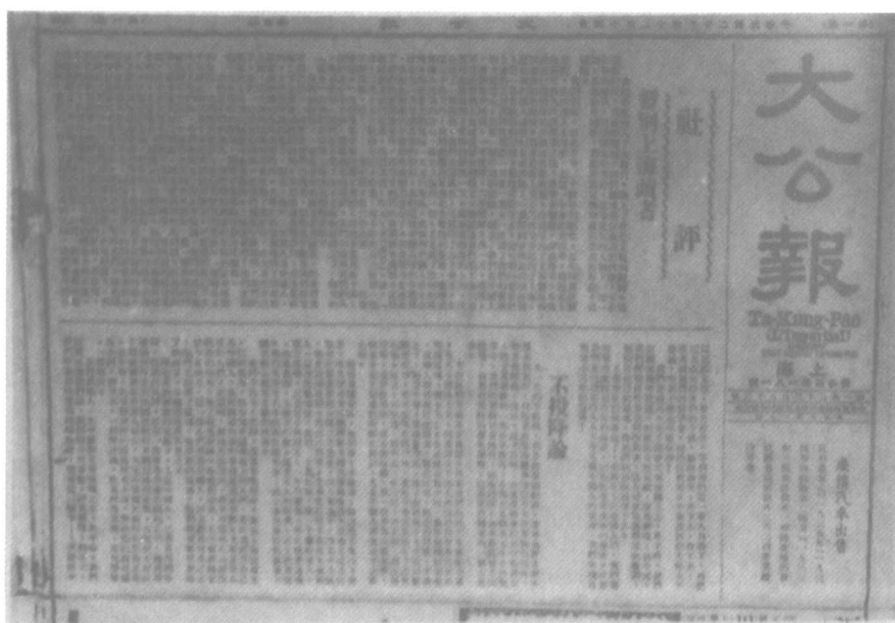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王芸生 20 世纪 40 年代在重庆



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馆址设在法租界爱多亚路181号。图为王芸生(中)、李子宽(右一)、费彝民(右二)、段继达(左一)、孔昭恺(左二)。



1937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拒绝日军检查新闻,宣布停刊。当日发表由王芸生撰写的《暂别上海读者》和《不投降论》两篇社评,被后人称为“报人的正气歌”。

芸生同志挽诗

少年苦学历荆榛

终作浮天击水鲲

人海燃犀尝烛鬼

论坛主笔仰扶轮

朝宗百折溪流志

报国千端老病身

十载论文风雨共

挥遗著勉重温

一九八零年六月
趙朴初

赵朴初先生为王芸生逝世所作的挽诗。

少年苦学历荆榛，
终作浮天击水鲲。
人海燃犀尝烛鬼，
论坛主笔仰扶轮；
朝宗百折溪流志，
报国千端老病身。
十载论文风雨共，
泪挥遗著勉重温。

一九八〇年六月

大公報創刊九十五周年

有容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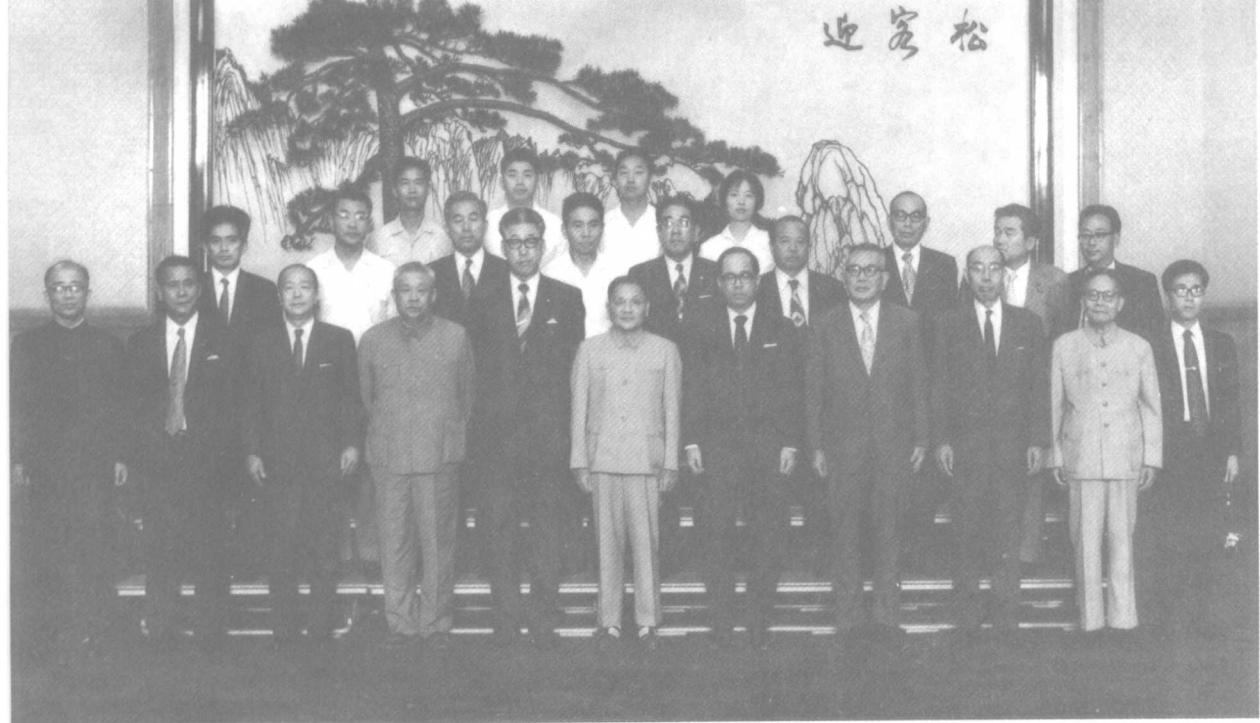
無私則公

錢其琛

一九九七年

二月二日

1997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为《大公报》创刊九十五周年题词。



1975年,邓小平(中)会见来访的日本朋友。参加会见的还有廖承志(左四)及王芸生(右二)、孙平化(左一)等。



1980年6月19日在王芸生追悼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向王芸生夫人冯玉文表示慰问。

·序言·

值得珍视的遗产

丁 东

我和王芝琛先生是五年前才相识的，介绍人是老朋友智效民先生。智效民因为撰写研究王芸生的文章，和王芸生的哲嗣王芝琛建立了联系。他们经常通电话。老智告诉我，王芝琛对他说：“你的几个朋友，高增德、谢泳，我都认识了，有机会还想和丁东认识一下。”

王先生比我年长，我自然应当去登门拜访。当时正好谢泳来北京办事，我就和他一起去看王先生。王先生居住的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我去过几家，比如李锐家、丁玲家，老同学常大林家。所以，到了王先生家，并无陌生之感，聊起来更是一见如故。我们不但有很多共同的朋友，而且谈古论今，有很多共同语言。当时，山西省作协的《黄河》杂志改为大型知识分子刊物，由谢泳主持，王先生赞不绝口。他请我们起到马路对面的小餐馆吃饭，还在谈论这份杂志。后来，这份杂志迫不得已，改回纯文学期刊，王先生又大呼可惜。

王先生那年六十二岁。他告诉我，退休好几年了。他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一直从事国防科技工作。1980年，父亲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边陪侍，向他追忆了平生的重大事件。那是一个大地行将复苏的早春季节，王芸老虽然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毕

竟是见过大世面，有过大阅历的一流学者、一流报人。他预感到，国人对20世纪的历史评价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于是，向儿子说出了郁闷在自己心里多年的话。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他陆陆续续与儿子谈到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他一边说，王芝琛一边录音。王芸老体力已经很差，有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王芝琛当时不能完全理解，但毕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和钥匙。父亲临终的心愿，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他五十四岁，决定提前退休，专门从事与《大公报》相关的历史研究。十几年间，他“埋头于《大公报》故纸堆中，悉心研究，并采访大公报故旧，广搜博闻，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他积累大公报材料之丰富，于大公报史事之熟悉，朋辈中无人能及。”（唐振常语）。其实，王芝琛从小就喜欢文史，考大学的时候，本想报考北京大学的文科。但父亲一辈子舞文弄墨，后半生为此伤透了心，说什么也不许儿子学文。哈军工的名声当时并不亚于北大、清华，一入校就穿上军装，这是很多青年梦寐以求的。但这并非王先生兴趣所在。所以，他退休后如同蛟龙归海，很快成为文史天地的高手。

我在和他见面以前，就在《老照片》、《文汇报读书周报》、《黄河》、《书屋》等报刊读过他的文章，印象颇好。唐振常说他文章的最大特色是“信而有征，以事实为依据，不空谈，不虚夸”。“不作危言高论，但直道其事，直述其经过，读后自然形成结论”。我的感觉是，王先生善于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传达更多的有效信息，他选择的细节，往往一下子抓住要害，干净利落，快人快语，没有一句废话。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现在学院派的训练，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很简单的事情或道理，偏要拉成很长的文章。引经据典，装腔作势，让人不胜其烦。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先生喜欢文而没进文科院校，或许是一件幸事。否则，读了文科，染上那个时代的通病，文章能不能写得像现在这样好，就很难说了。

2000年夏天，工人出版社编辑王建勋先生和我商议，策划一套学术随笔，名为《学灯文丛》。组稿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王先生。他不但文章好，而且主题集中，不曾结集出书。和他一联系，他也很高兴。原来2001年9月26日，是王芸生先生百年诞辰。2002年6月17日，是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

公报》百年纪念。在这之前，如果能把他关于《大公报》的随笔成书出版，可谓正逢其时。书编得很顺利，出版有一点小波折。毕竟，以图书的形式重新评价《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不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最后，出版社想了一个两全之策，在卷首加了一段“出版人语”，表明出版社“对作者的许多观点不能苟同，故在编发时做了若干删节”。

然而，这本名为《百年沧桑》的集子问世之后，还是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响。2002年，《大公报》诞生百年之际，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王芝琛的观点几乎成为舆论的共识和纪念的基调。几十年间泼在《大公报》上的污水，基本上被荡涤一清。

王芝琛的研究，改变了学界和舆论界对老《大公报》的历史定位。现代报纸在中国诞生一百多年来，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传统，一个是党派报纸的传统，一个是民间报纸的传统。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后一个传统中断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深刻的转变，报业也从此前三十年单一党报的格局开始走向多元的进程。此时此刻，人们回顾总结当年以文人论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特色的《大公报》，以及民国时代其他民间报纸的传统，便不难认识到他们的历史意义和未来意义。

1926年9月，张季鸾提出了《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连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盖随声附和是谓盲从；

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纵观世界各国，报纸和政党、政权之间，大致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从属的关系，一种是独立的关系。执政党派的报纸，充当政权的喉舌顺理成章；非党派的报纸，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选择独立却并非易事。新记《大公报》标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就是想选择独立的关系。尽管有人总想证明它和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之间有某种依附关系，其实这是不公正的。《大公报》虽然不可能超出当时的环境，但确实为践行“四不”做出了尽可能大的努力。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八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大公报》当时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态度，有的与国民党不同，有的与共产党不同。报纸想在两党之间“中道而行”。有时既不能让国民党高兴，也不能让共产党满意。但是，今天对《大公报》作历史的评价，是应当以当时某一党的某一具体政策作为评价依据，还是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根据全面的事实真相加以重新检讨呢？比如雅尔塔会议，苏美英三大国的巨头，为了让苏联早点对日宣战，背着中国，把属于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许诺给苏联，作为中国人办的报纸，难道没有权利发出批评的声音么？因为它“不党”，所以，在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对峙中，不论是当朝的国民党、蒋介石，还是尚未执政的共产党、毛泽东，都不曾低估它的影响力。1941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逝世，蒋介石出席葬礼，毛泽东发去唁电，给予高度评价。继任者王芸生，在与国共双方领导人接触中，也得到了很高的礼遇。两党对峙的时候，自然都希望居于中间的《大公报》发出对己方有利的声音。但当一方完胜后，中间力量便不再成为影响天平左右的砝码。《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从此成为绝响。惟其如此，《大公报》的历史和大公报人的活动更有其值得珍视和总结的一面。以王芸生先生来说，从一个只能靠包茶叶接触报纸的小店员到担任一张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大报主笔和总编辑，其间经历的艰难曲折和所作的坚忍不拔的努力与所走的不平凡道路，给后人做出的示范和提供的经验是非常宝

贵和丰富的，而我们过去做过多少虚诚的客观的了解和研究呢？

王芝琛不以新闻史研究为业，但他对新闻史研究的贡献，却远远高于许多专业人士。他的书受到知识界的好评，东北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来向王先生约稿，请他写一本《王芸生传》。为父亲立传符合王先生的心愿。从资料的掌握、情况的熟悉、理解的深刻诸方面看，他也是为王芸生立传的最佳人选。2002年新年春节期间，他废寝忘食地赶写此书，按时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将书稿交给领导审阅。领导看了却说，这本书既不能得大奖，又不能赚大钱，出它干什么？出版社拒绝履约，而且不作任何补偿。王先生一介书生，失望之余，只有长叹！王芸生是什么人？他不但是中国现代报界巨子，而且是中日关系研究的开山人，毛泽东和许多各界要人都重视他的活动、著述和影响。如今，他的传记到了某些势利的出版人手里，却如同废纸！我听说此等情况，也唏嘘不已。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从头努力。两年来，我的朋友宋庆光、陈敏等先生，都有意寻找投资，出版此书。无奈他们本身不在出版社，掌握不了出版的全过程。

今年5月30日，突然收到王芝琛先生的一封信，告诉我查出癌症，病得不轻，希望想想办法，让他有生之年看到这本为父亲写的传记问世。

我吃了一惊。王先生今年才六十七岁，虽然有糖尿病，但和他多次来往，觉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么突然间就遇到这样的灾难？

我知道刘硕良先生是有胆有识又有高效率的出版家，刚刚帮我的一位朋友赵诚出了一本黄万里的传记，此事找他，也许有望。于是，我与刘先生联系。他痛快地答应，三个月内一定让这本书印出来。

在此期间，王先生在肿瘤医院切除了结肠的病灶，但肝部和肺部已经扩散，即将作化疗，能不能闯过鬼门关还未可知。前几天，我陪刘硕良先生的副手汪正球去王先生家签合同。刚刚出院的他，明显瘦了一圈，说话也不如从前那样有中气。他对我说，他不想死。我感到，这部传记，维系着他生活的勇气和生命的意义。

愿王先生能够驱走死神的阴影。我还等着你的新作。

目录

Contents

001 序言/值得珍视的遗产/丁东

001 小引

介绍人信口而出的两个字让王德鹏改名为王芸生，这个出身贫寒、抱负远大的天津青年可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介凡夫俗子。他的活动、他的文字和几十年中国的风云变幻相伴相连，相依相存……

002 1.打出来的私塾学生

“这孩子聪明过人，千万不要让他辍学呀！”连外号“陈扒皮”的私塾老师也对王芸生寄以厚望，但交不起昂贵学费的他还是圆不了进南开中学的梦。

005 2.挑灯夜读的小店员

在茶叶铺打工，第一次看到报纸，第一次给报纸投稿——大姐每月省下五十个铜子给他订了一份《益世报》——木行副经理破例让他借支四十块大洋念函授英文——“五四使我接触了新文化，打下了做人的基础。”

009 3.包办婚姻终成一生伴侣

有了三十元的月薪，生活宽裕了。母亲为他精挑细选了一位憨厚的冯姓胖姑娘为妻。他勉强无奈地接受，开始三天都没有圆房，以后就慢慢离不开这位勤劳贤惠的妻子筑起的安乐窝了。

013 4.在革命风浪中沉浮

发挥写作才干，声援工人斗争——博古、彭述之介绍入党——二哥被捕，老母亡故——“我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弃一切政治，安心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



017 5.与张季鸾笔战,进了《大公报》

面对侵略者还要“躬自厚”?《华北新闻》社论作者王芸生与大名鼎鼎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展开笔战。谁想二人竟由此结为终生师友。辞去《商报》总编辑后,王芸生的命运就与正蒸蒸日上的《大公报》连在一起了。

022 6.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欣然领命主持《大公报》新辟的“明耻”专栏。所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专栏中连载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027 7.奋笔疾书爱国篇章

目睹国家的衰弱,民族的忧患,王芸生大声疾呼: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好中国人!——“中国现在需要无数的文天祥、史可法,但有一个石敬瑭、吴三桂便足以亡国。”

031 8.上庐山采访,给蒋介石讲课

蒋介石两次接见——汪精卫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很是重视——段祺瑞深感治国之道在于“维持人民,提倡商业”,认为中日关系“局面阔大,富有世界性,而非中日间局部之事”——林森于《大公报》多有奖语,强调“舆论监督政治及指导政治要双管齐下”。

034 9.重回上海与遥寄北方青年

“重回上海,发觉这里还是乱糟糟的不见什么进步”——“六寄北方青年”,一片语重心长:学生自当“读书第一”,不宜过早“卷入党争”。这些观点他临终前想起来还认为是正确的。

039 10.短评风波与拎包小事

在文艺界痛悼鲁迅逝世之际,王芸生一篇即兴而发的短评竟气得萧乾辞职,招来的责备声不绝于耳。这个阴影一直追随到他后半生。当年的电影明星蓝苹争着帮王芸生夫人拎包这件小事也惹出一连串是非。

043 11.在“西安事变”中的言论

批评西安事变,主张团结建国,支持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项国策、四点保证。

047 12. 擂起全面抗日的战鼓

近代中国战争尚未有过全国的对外战争，现在不同了……文人王芸生以一介书生之力擂响全面抗日的战鼓。他说：我们以积弱之国与强敌相拼，即便败于力，也万万不可输掉气！“败于力尚可复兴，输掉气则不可再活。”

052 13. 撰写不投降的悲壮之歌

奏响报人的“正气歌”：“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我们是报人，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058 14. 团结抗战的汉口岁月

“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大公报》人不但用笔，还建立剧团，演出话剧，为抗战服务——《中国万岁》轰动武汉，门票收入捐助伤兵——两次拒绝陈诚聘请，说：“戴盆何能望天！”

067 15. 初到重庆遭日机滥炸

社址屡遭日寇毁坏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在防空洞里编报印报，创中国报业史之最，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奖章——敌机在头顶肆虐，病中的张季鸾拥被而起，要王芸生马上写一篇社评，题目就叫《我们在割稻子》，王芸生灵感顿生，用象征手法形象生动地传扬中国人民镇定自信、坚毅果敢地抗击敌人的不朽精神。

074 16. 苏日中立，潜伏问号

张季鸾要求社评应当把《苏日中立条约》的肮脏交易讲清楚，但再三叮嘱王芸生把苏联和日本区别开来，只要苏联悔悟，仍然可以成为我国的盟友。

077 17. 中山条战役与周恩来的来信

周恩来亲笔给张季鸾和王芸生写信，除批驳日寇谣言外，一层层解释《大公报》对八路军的误会。

081 18. 总编辑张季鸾去世

王芸生觉得张季鸾“极难得的是他具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极得要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



解”，“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张季鸾则由衷赞叹“王芸生文章好，人品也好，编辑业务交给他可以放心。”一次，他边看社评边夸：“好，写得好！”并对在一旁的贺善微说：“我写也不过如此。”

087 19.主张清明政治，倡导“紧缩政策”

我们缺乏真正俊伟的政治家，而以权位荣利为目的而从政的人却太多了——王芸生提出政治修明之途，“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针对物价飞涨，金融紊乱，机构臃肿，特邀社外专家谷春帆撰写，一月之内连发十篇社评，倡导紧缩政策，引起孔祥熙不满。

091 20.飞机洋狗，舆论大哗

营救胡政之的飞机走出来的却是几条洋狗、几位老妈，孔二小姐亲自前来接应，《大公报》披露这一丑闻，群情激愤，舆论哗然。事隔四十年，王芸生小女儿在纽约出席一次聚会，还遭孔二小姐报复，说“王芸生是共产党”。

094 21.心系中原，飞来横祸

《豫灾实录》和相关社评，透露河南惨状，直刺官场腐败，激怒了蒋介石，《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执笔者则被军警拘捕。三日后复出的《大公报》销量激增到十万份。

096 22.发起“爱悔恨”运动

耶稣济世是由于爱，马克思倡社会革命是由于恨，佛陀普渡是由于悔，王芸生、谷春帆、林同济据此发起“爱悔恨”狂飙运动，希望把沉闷萎靡的人心激荡起来，“使人们心灵深处冒出浓烟”，“省察自己的言行，检查自己的良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的过失”。

100 23.爱情道路上的插曲

为女儿升学破例找了南开中学校长，终于满意地看到子女圆了他当年的“南开梦”——才貌双全的女状元程小姐执著地向王芸生求爱，就是做二房也要跟着王芸生——冯玉文动情地掉下眼泪，用她善良宽厚、诚实坦荡、纯朴无私的感情和行动征服了丈夫的心。

103 24.为抗战胜利着急

《论豫湘战事》、《感激衡阳守军》、《在大艰难中作大

努力》——胜利喜人，胜利逼人——“当前的世界，领袖时代就要过去了，继此而来的是平民的世纪”，治理国家，“主要的必须顺从人民的要求，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

110 25.重庆谈判期间的风风雨雨

“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王芸生与毛泽东有关“炉灶”的对话，无意间竟风靡史坛——对毛泽东呼喊的口号，向来思路敏捷的王芸生，除了表示“惊讶”外，一时难以说出其他什么感想——重庆谈判后期，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王芸生专访章士钊，提出应暗示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

119 26.指责国民党接收人员“失尽人心”

“收复失土，千万不要失去人心。”——“胜利就是胜利，怎么倒会成了灾难？”——“为江浙人民呼吁”，“休说重庆来！”——王芸生晚年，还谈到“四人帮”垮台是因为“人心丧尽”，国民党垮台是“失尽人心”，将两事联系起来叹道：人心永远是杆秤。

124 27.马歇尔调停与政协决议

把和平希望寄托在马歇尔调停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他说：“只要停了手，只要停了打，任你怎样谈，我们小百姓都欢迎！”“停战了！停战了！但我们再申明一声：这不是一时的停战，应该是永久的弹战！”他认为问题完全解决了，因此急忙安慰国民党，给各党派加压力……

127 28.如何走和平、统一、民主、建国之路

为便于讨论并较容易了解起见，王芸生先说“假如我是蒋主席”，而后又“假如我是毛先生”，分别对国共两党表达“美好愿望”，奉劝双方要“政争”不要“兵争”，以期国家民主宪政之实现——“好一位妙舌生花的说客呀！”《新华日报》社论尖锐地剖析了问题的实质，指出王芸生是在“拉偏架”，是在替国民党帮忙：“《大公报》是大公呢？还是大私？”让人再次想起《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

133 29.《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

看到新发表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后，王芸生把早已写好压于箱底的一万多字的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翻出来，在重庆《大公报》分四次连载，并在“补

识”中号召人们“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文章影响很大，受到的批评也很猛烈。

135 30. 东北问题与苏联问题

雅尔塔秘密协定让王芸生写下克制、委婉的三篇社评，青年学生们对苏联表示强烈不满——国民党特工人员企图嫁祸学生的目的终于达到——《新华日报》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怒斥王芸生为“反苏”特务暴行之先锋。对此王芸生直到晚年仍难平于心。

143 31. 再回上海与长春之战

《大公报》上海版复刊，沪馆定为总馆——装着满脑子的东北问题，王芸生写下了让他后半生永不得安宁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新华日报》社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打击人民、残害人民、撕毁诺言、发动内战的凶恶嘴脸，指斥《大公报》社评作者为“可耻的造谣者”。

148 32. 厌烦内战：寄希望于梦中

残酷的现实，糟糕的国情，使王芸生颇感心力交瘁，只有到梦中去寻找出路——梦过了，回到现实，得到的是连串烦闷：“就算打下去吧！何时打完？是一大烦闷。打完了，国家能好吗？又是一大烦闷。”他不愿作结论，所以仍然是烦闷。

150 33. 《世界需要中道而行》

“今后国际大势将走向两个世界：一个是英美集团世界，另一个是苏联集团世界。”中国应该怎么办？王芸生认为应该“中道而行”。他再三主张中间国家要走中道，切莫“一边倒”，中道“可走，应走”，却因此而被批判为“最反动的中间路线”，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有不少人省悟过来……

152 34. 反对召开“国民大会”

蒋介石一意孤行，召开国民大会，王芸生感到局面的危险——他的两点希望，只能是虚幻的空想——不管文章讲得如何有道理，于实事已然无补了。

155 35. 反对美国扶植日本

应麦克阿瑟元帅邀请，王芸生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反复讲述美日阴谋，反被《中央日报》斥为“火上加油”